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谱写壮丽的英雄之歌

深圳 苦难中浴血奋斗，披荆斩棘迎春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历史节点，让我们一起翻开史册，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深圳的萌芽、发展。从1924年，上级党组织派人到宝安从事建党工作，到次年上半年建立党小组，随后逐步建立宝安县党组织，深圳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英雄之歌，也谱写了广东地方党史中波澜壮阔的重要篇章。



思月书院，省港大罢工接待站

文李晓旭 图王磊

宝安县党组织创立 革命运动有了坚强领导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其后，随着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广东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地。

1924年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共产党员黄学增、龙乃武等，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宝安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组织。1924年底，黄学增等在沙井、松岗、公明等村镇发展了第一批党员。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各区相继成立了党小组。至1925年底，先后有5个区建立起楼村、周家村等11个党小组。

1925年7月中旬，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深圳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宝安县支部，黄学增任书记，支部委员有黄学增、龙乃武、郑爽南，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1926年3月，宝安党组织决定

撤销县党支部，建中共宝安县支部，并推选龙乃武为县支部负责人。1928年2月23日，宝安县在燕川村召开全县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9人，这是宝安县的第一次党代会。

宝安县党组织成立后，加强了对群众的发动和组织。从此，农民运动以及今后的各种革命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深圳地区成为广州与香港的联络点，深圳墟（今东门老街）南庆街22号思月书院被设为香港罢工工人接待站。处在罢工斗争前线的宝安县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配合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禁运粮食物资，援助省港大罢工。

另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深圳地区党组织领导了工农武装暴动，有力地支援了广州起义。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

香港沦陷文化人被困 宝安党组织全力参与营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随着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深圳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们都进行了“战略性转移”。抗战爆发后，深圳地区党组织恢复宝安党组织，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8年10月30日，时

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的曾生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离开香港，回到老家坪山，组建了中共惠宝工委，宣传抗日，发展组织，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第二年1月，由王作尧任大队长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深圳人民抗日武装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收复过南头、葵涌、沙鱼涌等地，有力打击了日寇的气焰。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大批著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宝安县党组织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即在香港湾

仔和宝安白石龙村成立了指挥部。1942年元旦，营救工作开始。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深圳地区武工队员、交通员和接待员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斗争，将茅盾、邹韬奋等一大批文化人士，经九龙、元朗，越过日军封锁线，安全撤到宝安白石龙根据地。少数爱国人士则从九龙西贡村乘船到宝安的大小梅沙，再转移到坪山根据地。何香凝、柳亚子等被直接护送到汕尾港，还有10多名文化界人士经长洲岛被护送到澳门，再转到大后方。

此外，大营救行动还营救了国民党驻港军政要员及其家属和英美印等籍的国际友人近百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表扬，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黄学增等人的塑像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战略防御转为进攻。在东江地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粉碎了日寇不断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一连串的进攻，抗日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东江纵队转战南粤各地，先后解放了惠阳、宝安、东莞等县及大小城镇数十座，被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宝安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批革命同志被杀害。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宝安党组织决定针锋相对，恢复武装斗争。1947年2月初，上级党组织派蓝造从香港回到坪山，整顿和发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成立了惠东宝人民护乡团。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8月下旬，中共宝安县县委和县政府成立，由黄永光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积极做好支前和迎接南下大军的准备工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6日，黄永光率县人民武装部队攻占县城南头。19日下午，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率接管人员160余人进入宝安县，接收国民党地方政权——深圳镇公所，成立深圳镇人民政府。

1949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团在当地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炮轰大铲岛。1950年4月18日，宝安地方党组织动员渔民400多人，出动渔船200只，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九零团部队进攻内伶仃岛，在伶仃洋大败敌舰27艘，消灭岛上千余残敌。至此，宝安县全境解放，宝安人民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和平建设新局面。



东江纵队北撤纪念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辛探索留下宝贵经验

探索中收获成功，鹏城栉风沐雨铸辉煌

文/李晓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深圳建市，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毗邻香港的特殊性，宝安县党组织长期面临复杂考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向香港供应淡水 and 输送鲜活农副产品等工作上，宝安县党组织发挥了特殊作用，宝安日益成为联系香港与内地的重要纽带。

宝安县土改 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开展起来。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拉开了帷幕。广东解放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即着手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1950年12月19日，以中共珠江地委宣传部长梁奇达为首的珠江土改工作团共600多人到达宝安，开展广东省土改试点工作。

1951年1月，宝安县全面铺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宝安属于侨乡兼老游击区，新中国

成立前不少地主掩护和帮助过东江纵队，许多华侨归国抗日，或者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土改初期，有人认为宝安“无匪可清，无霸可反，无租可灭，无押可退，无尝可清”。土改队通过“访贫问苦”深入群众，逐步解除贫雇农的顾虑，斗争了一批地主恶霸，缴获长短枪906支、子弹9112发、手榴弹940枚，打击了土匪恶霸等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土改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1952年10月，宝安县胜利完成土地改革，约18万农民无偿分得土地和生产资料，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调动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宝安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和华南分局的部署，宝安县掀起了“一化三改”的热潮。当时的宝安县有230公里海岸线，渔民众多。新中国成立后，宝安县政府将生产水平很低的500艘夫妻

连家艇组织起来，发展捕捞生产。1955年，宝安县领导渔民开展互助合作，蚝民们以“工友船”“拉头船”的形式建立起互助组，在政府支持下成立渔业、蚝业合作社，社员们的收入大大增加，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至1956年，宝安县全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渔业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深港两地情 与香港小额贸易

1961年8月13日，宝安县委召开边防工作会议，部署全县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深圳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第二步开放坪山、坪地、龙岗等8个公社。同时，开放南澳、沙鱼涌、盐田等13处口岸，作为“小额贸易”和非贸易进出口特定地点。社员可以向香港出售瓜果、生果、鲜鱼等物品，换回副食品、煤油等必需品。灵活边境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促使宝安经济形势很快好转，推动农业生产得以较快发展。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人

口的急剧增长，工业的快速发展，香港市民饱受饮用水不足的煎熬。1962年底，香港出现自1884年开始有雨量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在一年多时间内，香港居民只能2天或4天获得一次供水，最困难时为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饱受水荒困扰的香港当局向广东省政府请求援助。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向十分关注香港同胞严重缺少淡水的困难，并在宝安县兴建深圳水库。1959年11月15日，深圳水库动工，水库主坝铺设通向香港的输水管，当时3.8公里输水管所需要的800吨钢材无法解决，水库指挥部向国

院求援，周恩来总理亲自从鞍钢批了800吨钢材，给深圳水库解了这一燃眉之急。

为了长远解决香港同胞用水的极端困难，中央决定引东江水供应香港。这项工程被定名为“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即从东江引水，沿石马河多级提水到雁田水库，然后跨越分水岭流入深圳水库，再供给香港。从1964年3月至1965年2月，建设者们开山辟路，凿洞架桥，6座拦河坝，8座水泵站，硬是令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仅用时11个月，东深供水工程竣工。3月1日，在深圳水库举行供水典礼，广东各界和香港

同胞共同见证了一江清水，奔流入港，东江水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流淌不息的生命之水，已渗入香港的每一寸土地，更融入内地和香港同胞的血脉深处。

另外，1962年4月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三趟快车”正式启动，分别自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每日满载包括活畜禽和鲜果时蔬等在内的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抵运香港。从此，所有“三趟快车”抵深后，必须在笋岗铁路北站派驻海关工作组联检、消毒后，于次日凌晨运送香港，被誉为“香港同胞的生命线”。

首创“三来一补” 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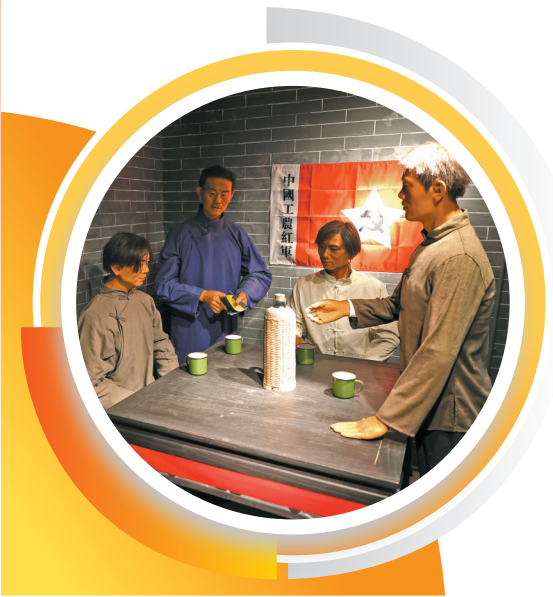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一天，当时的深圳轻工业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开办“石岩上屋热线圈厂”来料加工厂的协议书，即“深轻宝字001号”协议书。按照规定，由石岩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工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

这种业态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也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四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总称。2008年，在这家企业旧厂房上改建的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建成开馆，“深轻宝字001号”协议书也成为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最具价值、最有力的见证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宝安县建市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早在1975年，宝安县委已向广东省委提出：“考虑把宝安地区划为特区，建立特区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属地区一级

机构）。”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宝安县的这一建议，没有被省委采纳。1978年8月22日，惠阳地委给省委的“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报告”提出，“我们建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是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深圳市”这个名称。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主张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时，列举了深圳等10来个城市的名字。这样一来，深圳市的名称也得到与会广东省委领导人的认可。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设立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决定》，先在内部宣布执行，准备等国务院正式批准后再对外公布。同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以宝安县的行政区域为深圳市行政区域，下辖罗湖、南头、松岗、龙华、龙岗、葵涌6个区。新生的深圳市，很快就要被赋予一个重大使命——经济特区，它将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被委以重任，大有一番作为。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场景模拟